

定瓷雅集

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

SELECTION OF DING WARE
the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故宫博物院 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瓷雅集 : 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 /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34-0333-7

I. ①定… II. ①故… III. ①定窑—瓷器(考古)—中国—图集 IV. ①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3537号

定瓷雅集

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

故宫博物院 编

主 编: 吕成龙

图片资料: 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 万 钧

装帧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4-0333-7

定 价: 360.00元

学术顾问

耿宝昌

主编

吕成龙

副主编

王光尧 徐 巍 韩 倩

撰稿人

王焕玲 朱晓东 李卫东 孙 悦
陈 锐 陈润民 郑 宏 郭玉昆
徐 巍 高美京 高晓然 李 鑫
黄卫文 黄 英 董健丽 韩 倩
蔡 毅

摄影

王 运 刘志岗 刘明杰 毕 枫
孙之常 李 凡 范允明 金 明

翻译

周 怡

责任编辑

万 钧

装帧设计

李 猛

定瓷雅集

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

SELECTION OF DING W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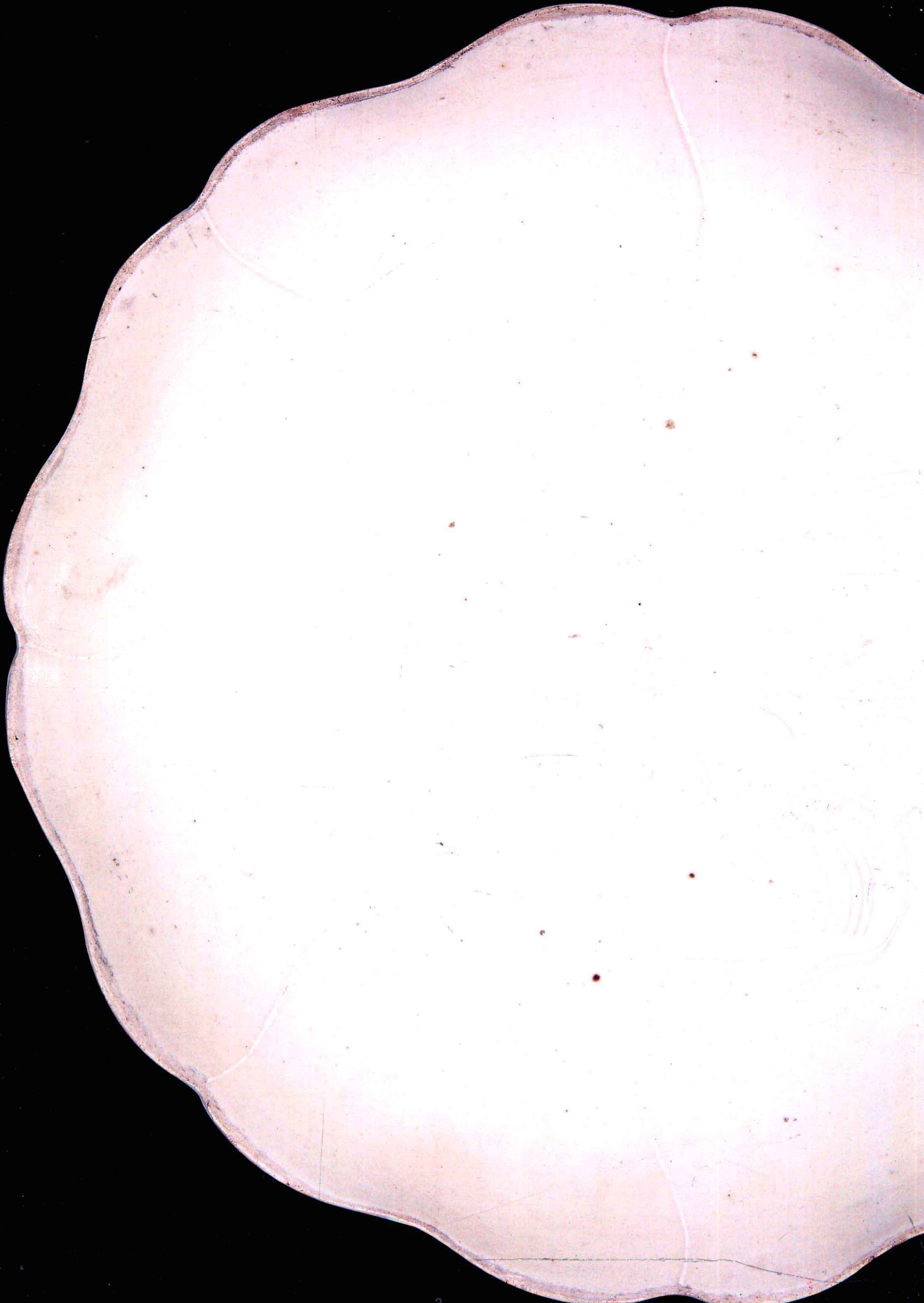
the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故宫博物院 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6	序	耿宝昌
8	定窑瓷器研究综述	吕成龙
22	图版目录	
29	图版	
338	后记	



CONTENTS

7	FOREWORD	Geng Baochang
20	ABSTRACT OF “REVIEW ON DING WARE STUDY”	Ly Chenglong
25	LIST OF PLATES	
29	PLATES	
338	POSTSCRIPT	

序

宋代五大名窑的定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白瓷窑场之一。从文献记载与产品的流向看，定窑在历史上兼有官、民窑双重属性。其烧造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繁荣昌盛，元代以后逐渐衰落停烧。北宋时期，定窑瓷器与宫廷有密切关系，是宫廷用瓷的最主要来源。金代，定窑供应宫廷用瓷的情况仍未发生大的改变。正因如此，定窑在历来文献记载及研究中均备受重视。

20 世纪 30 年代，经叶麟趾先生实地考察，确认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一带，自此，后续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相继展开。除涧磁村以外，在东西燕川村周边的台地上也发现大量窑业堆积。而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对定窑遗址进行的三次考古试掘与正式发掘，不仅出土了大量标本，更获取了可供断代研究的地层证据。定窑研究开始进入将窑址考古发掘品、塔基地宫和纪年墓葬等遗址出土品与传世品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时代，从而使学界对定窑的认识更加科学、客观。

定窑虽以烧造白瓷而闻名遐迩，但其多色釉和彩器也很精绝，影响深远。

2012 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以定窑瓷器作为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课题，所举办的“洁白恬静——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瓷器展”堪称该项研究成果的反映。此展览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定窑瓷器为基础，辅之以 2009 年考古工作者对窑址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以及西安火烧壁窖藏、临安水丘氏墓和湖南地区出土的定窑瓷器，以期通过诸多对比展示，使人们对定窑从晚唐到宋金元时期的产品面貌及明清时期仿烧定窑瓷器的情况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关于定窑的研究与认知。

耿宝昌

2012 年 8 月撰于京城

FOREWORD

Ding kiln, among the "Five Famous Kilns" of the So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kilns for making white porcelain in ancient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at where its products were found, Ding kiln was believed to be both official and folk in the history. Its porcelain production bega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prospered in the period from Northern Song to Jin dynasty. Since the Yuan dynasty, the porcelain production declined gradually and finally ended. Ding wa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la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ing the main resource of royal porcelain. This condition remained almost the same in the Jin dynasty. For these reasons, Ding kiln is given great importance in all previous records and research.

In the 1930s, by field investigation, Mr. Ye Linzhi confirmed that the Ding kiln site located at Jianci Village, Quyang County in Hebei Province. Since then, subsequent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began successively. Besides Jianci Village, at the platform around East and West Yanchuan Village, there was also a large pile of porcelain. In the thre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ests and formal excavations since 1950s, great many of samples were unearthed, furthermore, ground evidence were acquired for historical period division. Ding kiln research came to a new era, when unearthed objects such as ware and samples excavated from the kiln site, as well as tower foundations, underground crypts and tombs with record of year, were compared with handed down porcelain, making the research circle's recognition of Ding kiln mor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Although Ding kiln is famous for making white porcelain, its polychrome porcelain is also remarkable and influential.

In 2012, the Palace Museum Center for Ceramic Research concentrates on the research of Ding ware, with the exhibition "Pure and Quiet: Ding War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as a reflection of its research achievement. Most of the exhibits come from the Ding ware collected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addition with the newest kiln excavation achievement in 2009, as well as the hoard at Huoshaobi in Xi'an, Shuiqiu's tomb in Lin'an, and Ding ware unearthed in Hunan. It is hoped that, according to all these comparisons, people will have a comprehensive recognition to the Ding kiln production in the period from late Tang to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imitation of Ding wa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urther promoting the study and recognition of Ding kiln.

Geng Baochang
Aug., 2012 in Beijing

定窑瓷器研究综述

吕成龙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间窑场之一。虽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其遗址被发现以来，陆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定窑研究的论文及几部专著，内容涉及定窑的遗址情况、烧造历史、烧造品种、定窑系白瓷及定窑瓷器上的铭文等，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故宫博物院所藏定窑瓷器是定窑瓷器研究中最重要实物资料之一，特别是以北宋白釉孩儿枕、白釉刻花渣斗、白釉刻花梅瓶等为代表的清宫旧藏定窑瓷器，代表了定窑瓷器的最高水平，是 20 世纪 50 年代故宫博物院开辟“陶瓷馆”以来历次改陈首选展品，颇受人关注。

2012 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将定窑瓷器作为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课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举办专题展览并召开学术研讨会，堪称定窑瓷器研究中的一件盛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定窑瓷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定窑入围“宋代五大名窑”的经过及目前五大名窑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一。但实际上，“五大名窑”之说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

明万历十九年（1591 年）刊行的明代著名养生家高濂（生卒年不详，约嘉靖初至万历初人）撰《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条曰：“高子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则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磁也！而曹明仲则曰柴窑足多黄土，何相悬也？”高氏在这里只提到“柴、汝、官、哥”四窑^[1]。

与高濂生活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张应文（？～1595 年）《清秘藏》卷上“论窑器”条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缘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又曹明仲云柴窑足多黄土。未知然否？”张氏在这里提到“柴、汝、官、哥、定”五窑，比上述《遵生八笺》叙述中多出一个“定”窑^[2]。

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 年）进士谢肇淛（1567～1624 年）《五杂俎》“陶器”条曰：“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

[1]（明）高濂：《遵生八笺》卷一四，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71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2]（明）张应文：《清秘藏》，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 9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91 年。

[1]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二《物部》四,国学珍本文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2] 陆鹏亮:《宣炉辩疑》,《文物》2008年第7期。

[3] 《宣德鼎彝谱》卷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4] 傅振伦:《中国最古的瓷器》,《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6期。

[5] (北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三,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6]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辑入《丛书集成新编》第8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

[7] (南宋)周焯:《清波杂志》,辑入《丛书集成新编》第8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

[8] (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辑入《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

[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册四六《食货》五二,中华书局,1957年。

皆宋器也……”^[1] 谢氏在书中也谈到“柴、定、汝、官、哥”五个窑。

约成书于17世纪初^[2]的《宣德鼎彝谱》卷一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3] 书中提到柴、汝、官、哥、均、定六个窑。

民国初年许之衡(1877~1935年)《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曰:“吾华美术以制瓷为第一……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许氏在书中谈到柴、汝、官、哥、定五窑及均窑。

由于柴窑非但不属于宋代,而且一直是个谜,因此,到了现代,人们就逐渐略去柴窑不提,而直接提“汝、官、哥、钧(均)、定”五个窑,于是诞生了宋代五大名窑之说。20世纪50年代初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最古的瓷器》一文中曾谈到:“世之言瓷器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钧为宋代五大名窑,推而上之以柴、汝、官、哥、定为中国五大名窑。”^[4]

在所谓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钧窑均不见于宋代文献记载。哥窑的遗址至今未被发现,年代也有争议。官钧窑瓷器的遗址所在地不存在问题,但其年代长期以来存在很大争议。官窑研究中也存在很多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北宋官窑究竟是汝窑还是属于在开封另设的官窑以及在杭州发现的老虎洞窑是否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目前尚有争议。对汝窑的最大争议是汝窑的性质问题,即汝窑究竟是北宋朝廷设置的官窑还是只是为朝廷烧造过贡瓷的民窑。定窑的遗址所在地及烧造历史、烧造品种目前在学术界不存在大的争议,争议较多的是五代、北宋定窑产品与辽代瓷窑产品的区分、北宋定窑瓷器和金代定窑瓷器的划分等。

二 宋代文献中有关定窑的记载及定窑遗址的发现经过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座主烧白瓷的窑场。虽然宋代文献中已经出现多处有关定窑的记载,如: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1037~1101年)所作《试院煎茶》诗曰:“蟹眼已过鱼眼生……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5]

南宋陆游(1125~1210年)《老学庵笔记》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6]

南宋周焯《清波杂志》曰:“辉出疆时,见彼中所用定器,色莹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7]

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开篇“天下第一”条中曰:“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磁、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京师妇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8] 清徐松(1781~1848年)《宋会要辑稿》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9]

宋邵伯温(1057 ~ 1134 年)《闻见录》曰:“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1]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窑器”条及南宋叶真《垣斋笔衡》“窑器”条均曰:“陶器自舜时便有……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2]

然而,自元代晚期定窑逐渐衰落停烧以后,其遗址亦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中,被人忘记。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叶麟趾教授(1888 ~ 1963 年)在河北省曲阳县调查时,才偶然发现定窑遗址。1934 年叶先生在所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谈到:“定州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定州窑地址,参诸文献所载,皆指为今之河北省定县,然经实地调查,则绝无窑迹可寻。当地之大白窑村虽属近似,亦无确实之证明。或谓自唐以来所称定州,非只限于今之保定与正定之间者,其地域较为广大,即保定、正定、平定等处亦皆包括在内,总名曰定州。故凡由此等地方所出窑器,均称为定窑云。是说未免过于广义者,因平定窑当时俗称西窑,其窑器与所谓定器比较,显有不同之点,且保定、正定亦皆无相当之窑迹也!曩(nǎng,以往,从前,过去的。笔者注)者闻说曲阳产磁,偶于当地之剪子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磁破片,绝类定器。据土人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又附近之仰泉村,亦为定器出产地,然已无窑迹矣!此说诚有相信之价值。且旁考地理上之关系,则曲阳距定县约四十里,唐名恒阳县,原属定州,盖所称定州,乃指其大地名而言,非专指今之定县。即如唐之邢州窑在距今邢台县约五十里之内丘县,饶州窑在距今鄱阳县即昔之饶州府约一百八十里之浮梁县,是其最明显之比例也。现今曲阳县尚有制陶者,器虽粗糙,然确属定窑之本派。或谓定窑废灭于元末,盖因当时已无优良之品,故无关于此后曲阳之制作也。”^[3]

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先生(1892 ~ 1969 年)曾认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而且指出叶先生所谓的“剪子村”即“涧磁村”、“仰泉村”可能就是“燕山村”(其实应为“燕川村”,笔者注)。陈万里先生还谈到:“抗战期间,曲阳沦于敌区,当时日人小山富士夫曾经去过,并采集碎片极多。”^[4]小山富士夫(1900 ~ 1975 年)前往曲阳县调查定窑遗址的时间是 1941 年 4 月^[5],他是世界上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有日本学者认为“小山在陶瓷研究最高的成就是定窑窑址的发现及时代的分期”,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准确。上述很显然,定窑遗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由叶麟趾先生调查发现并确认,小山富士夫先生的曲阳之行只能算作对定窑遗址进行复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随着中国口岸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先是各地兴建铁路发现大量古墓,墓中出土文物被文物贩子收购后卖给外国人,致使盗墓之风猖獗,不计其数的出土文物在社会混乱、政府无力制止的情况下被贩卖到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对中国陶瓷购藏的热潮。继而与之相适应,普及中国古陶瓷的著述和译著亦开始较多出版,并随之热销。如 1856 年朱利恩(S. Julien)等人将 1815 年在中国刊印的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译成法文在巴黎出

[1] (宋)邵伯温:《闻见录》,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38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2] 这两本南宋人的著作均已佚,分别收录于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说郛》、《南村辍耕录》中。《说郛》100 卷,元陶宗仪纂。涵芬楼藏版,据明抄本。卷一八引顾文荐撰《负暄杂录》三卷,又补遗一卷。顾文荐,南宋人,字伯举,号兰谷倦翁,昆山入。《南村辍耕录》30 卷,元陶宗仪撰,卷二九引叶真撰《垣斋笔衡》。叶真,字子真,号坦斋,池州青阳人,隐居九华山,以著书自娱。中华书局,2004 年。

[3] 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第四章第一节,(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 年。

[4] 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9 期。

[5] 小山富士夫:《定窯々址の発見に就いて》,《陶磁》13 - 2、1941。

版。1876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奥古斯塔斯·弗兰克斯(Augustus Franks)将自己收藏的中国和日本陶瓷结集以英文出版,名曰《东方陶瓷收藏图录》(*Catalogue of Property of Oriental Pottery and Porcelain*)。1896年,英国人斯蒂芬·布谢尔(Stephen W. Bushell, 1844-1908)编著的名著《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出版发行。1898年和1902年,由威廉·古兰德(William G. Gulland, 1841-1906)编著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上、下册分别首次出版。1913年,德累斯顿陶瓷收藏馆馆长齐默尔曼博士(Ernst Zimmermann, 1866-1940)编著的两卷本《中国瓷器的历史、艺术和工艺》(*Chinesisches Porzellan Seine Geschichte Kunst a Technik*)得以出版。1922年,大英博物馆赫瑟林顿(A. L. Hetherington, 1881-1960)编著的《中国早期陶瓷》(*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得以出版。1925年至1928年由霍布森(R. L. Hobson, 1872-1941)编著的《乔治·欧默福普洛斯所藏中国、朝鲜和波斯陶瓷》(*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D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六卷在英国伦敦出版。1927年,英国著名作家威廉森(G. C. Williamson 1858~1942)编著的《粉彩瓷器》(*The Book of Famille Rose*)首次出版。继20世纪20年代欧洲出版一系列中国古代美术专著后,在随后的30年代,这一收藏和研究中国艺术品的热潮波及世界。1931~1932年,日本东洋陶瓷研究所出版了12辑的《东洋陶瓷集成》。1932年,日本帝国工艺会编印出版了《支那工艺图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欧美人士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文献、传世品,而是开始注重开展实际性的追根溯源工作,即亲自到窑址进行调查。1930年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年)派遣日本西本愿寺驻在中国汉口的布教师原田玄讷去河南省临汝县作过古陶瓷窑址实地调查。1935年6月27日,在上海海关任职的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卢默教授(J. M. Plumer 1899-1960)曾到福建省建阳县调查建窑遗址,采集了大量建盏及窑具标本,并在1935年10月26日《伦敦新闻画报》第187卷第5036号上发表了题为《世界著名的建窑瓷器原产地揭秘——一项值得关注的堪称宋代天目碗宝库的窑址的发现》的消息^[1]。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英国人白兰士敦(Archie D. Brankston 1909-1941)实地考察了景德镇珠山及湖田窑遗址,1938年出版了由他编著的《明初景德镇瓷器》(旧译《明初官窑考》)^[2]。

小山富士夫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察。他在《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中谈到:“一想到这个发现是国际间的一大竞赛,即抑制不住冲动,遂勇往直前。”“此事是关乎陶瓷史的问题,驱使春季之旅成行,因我不愿只是个追随在英美学者后的学徒。”^[3]

定窑遗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规模最大的窑场在涧磁村、野北村、东燕川村、西燕川村及北镇村一带,总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因曲阳县在唐、五代时曾隶属于定州管辖,北宋时曾隶属于定州博陵郡管辖,故名定窑。

1949年以来,考古和文物工作者对定窑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1951年4月,故宫博物院陈万里、杨忠礼先生曾调查过曲阳县的东西燕川村(调查报告称

[1] J.M.Plumer, *The place of origin of the world famous Chien Ware discovered. A remarkable find of kiln-sites that are a mine of Temmoku bowle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ol.187, No.5036, Oct.26, 1935.

[2] A. D. Brankston, *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 Peiping, Henri Vetch*, 1938. 白兰士敦:《明初官窑考》,北京法文图书馆出版,1938年。

[3] [日]弓场纪知撰,廖桂英译:《小山富士夫的陶艺世界》,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编:《陈昌蔚纪念论文集》,财团法人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3年。

作“燕山村”)和涧磁村窑址^[1],并采集部分标本。1957年3月,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王莉英、郭仁、葛季芳等也曾前往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采集瓷器标本近两千片^[2]。20世纪60年代初,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与试掘,从1960年开始到1962年5月底,共开9个探方,总共试掘面积420平方米。在调查中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35件。在试掘中获得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和窑具26件、铜钱67枚^[3]。1977年4月、1982年9月、1991年,故宫博物院均曾派人前往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并采集瓷器标本^[4]。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北镇村、涧磁岭、野北村、燕川村等地进行过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大量窑炉和作坊遗迹,出土基本完整的遗物标本万余件、残片约37万片(发掘报告至今未见)。最近一次主动进行的大面积科学发掘是在2009年9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4个地点布方发掘,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发掘出数以吨级的各时期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标本达数千件。这次发掘对于全面了解定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面貌和烧造工艺特征、促进定窑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5]。

三 重要遗址和墓葬出土定窑瓷器概况

除了进行窑址调查和发掘以外,1949年以来,在考古工作者对各地墓葬、遗迹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也出土了大量定窑瓷器及少量印模工具。比较重要的有:

1956年发掘的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东门外五代(吴)大和五年(933年)墓,出土14件完整定窑白釉瓷^[6]。

1961年发掘的辽宁省朝阳市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壁画墓,出土两件定窑白釉碟^[7]。

1969年发掘的河北省定县两座北宋塔基,出土150多件定窑瓷器,其中16件署“官”字款、一件署“新官”字款^[8]。

1975年发掘的北京通县城关公社三间房村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墓出土29件定窑白瓷^[9]。

1971年发掘的辽宁省北票县北四家子公社水泉大队辽墓出土6件定窑白瓷,其中一件署有“官”字款^[10]。

1971年发掘的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卒于庆元二年,即1196年,葬于庆元三年,享年50岁)墓,出土定窑白釉碗三件、盘一件,盘、碗均镶有银釵^[11]。

1973年发掘的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8件定窑白瓷^[12]。

1978年发掘的河北省曲阳县北镇村定窑遗址,出土4件金代印花模子,分别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泰和丙寅岁辛丑月二十四日画张记”、“甲辰蕤宾十四日刘六郎”、“刘家模子何”题记^[13]。

[1] 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2] 冯先铭:《瓷器浅说:定窑》,《文物》1959年第7期。

[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

[4] 吕成龙主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5] 韩立森等:《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2日。

[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五代——吴大和五年墓清理记》,《文物》1957年第3期。

[7]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年第4期。

[8]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9]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

[10]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2期。

[11] 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年第4期。

[12] 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13] 妙济浩、薛增福:《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文物》1985年第7期。

[1] 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

[2]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4]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5]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6]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8]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9]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第12期；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岳麓书社，1984年；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10] 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第12期；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 鲁琪：《北京门头沟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第5期；李红军：《辽代陶瓷与鉴赏》页207，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12] 杜劲甫：《晚唐、五代南方白瓷研究初步报告》，《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13] 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第4卷，图版32，科学出版社，2008年。

[15] 金毓黼：《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页36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6]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第2卷图版64、图版65、图版66，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78年发掘的浙江省临安县（1996年临安撤县建市）晚唐钱宽（葬于光化三年，900年）墓，出土15件精致定窑白瓷，其中13件署有“官”字款，一件署有“新官”字款^[1]。

1980年发掘的浙江省临安市晚唐水邱氏墓出土17件定窑白瓷，其中3件署“官”字款，11件署“新官”款^[2]。

1984年发掘的河南省巩义市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37件定窑白瓷，其中13件署有“官”字款^[3]。

1985年发掘的西安市北郊火烧壁村一瓷器窖藏，出土33件晚唐时期定窑白瓷^[4]。

1985年发掘的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出土35件定窑系白瓷^[5]。

1986年发掘的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出土12件定窑白瓷，其中刻莲瓣纹盖罐署有“官”字款^[6]。

1992年发掘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朝克图山辽耶律羽之（葬于辽会同五年，即942年）墓，出土一批五代定窑瓷器，包括白釉盖罐、白釉穿带盘口瓶、白釉盒、绿釉印花穿带瓶、酱褐釉皮囊壶等^[7]。

对于“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一是认为非定窑莫属；二是认为绝大多数是定窑产品，也有少量邢窑产品；三是认为除了定窑、邢窑以外，尚有浙江窑口^[8]、湖南窑口^[9]、辽代官窑^[10]、北京龙泉务窑^[11]、安徽繁昌窑^[12]等窑口的产品。

笔者认为利用类型学方法判断“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时，一定要综合起来观察其风格特征，因为瓷器是手工艺品，其烧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使是同一窑烧成的瓷器，其工艺、釉色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切忌以点带面。就笔者观察，这类瓷器基本上都是定窑产品，不可能是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瓷窑以及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内蒙古赤峰窑及辽宁省辽阳市的江官屯窑产品。由于2003年8月河北省内丘县城邢窑遗址首次出土“官”字款白釉碗底标本十余件，尤其是其中一件“官”字款白釉碗标本的外壁粘连大半个匣钵，因此，足以证实晚唐至五代邢窑烧造“官”款白瓷^[13]。也就是说在目前发现的“官”款白瓷中，可能有极少量邢窑产品，但究竟哪些是邢窑产品，还有待于邢窑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对标本和完整器进行科学测试。

必须承认，以往出版物中，有不少明显是定窑烧造的白瓷却被定为辽代瓷窑产品。如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姜家营子乡大营子村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了一批以白釉五瓣花口碗、白釉金釭“官”字款花口盘^[14]为代表的精细白瓷器，明显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六年（959年）定窑产品，但自该墓被发掘后，却一直被认定为辽赤峰窑产品^[15]。再如1956年辽宁省建平县朱碌科乡王胡子沟村辽墓出土的白釉“官”字款碗、白釉花口碗、白釉“官”字款盘口细颈瓶等，明明是五代定窑产品，但两件碗却被定为“辽窑仿定窑精品”，瓶则被认为是“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烧造”^[16]。

上述北宋、金代和南宋墓葬出土的定窑瓷器，为定窑瓷器的时代划分提供了标准器。特别是金代和南宋墓葬出土的定窑瓷器，反映出金代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国统治的淮河以北地区，而且也曾被运往江南地区销售。上述定窑遗址出土的署有“甲辰”（大定二十四年，即 1184 年）、“泰和丙寅”（泰和六年，即 1206 年）纪年的印花用陶模，为鉴别金代定窑瓷器提供了标准。

四 定窑的烧造历史

关于定窑的始烧和终烧年代，需要人们将文献资料与调查、发掘定窑遗址及其他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但鉴于窑址考古发掘的局限性及考古资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致使以往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形成不同推断。有学者认为定窑创烧于晚唐^[1]；有学者认为定窑创烧于唐代早期^[2]；也有学者认为定窑创烧于中晚唐，早不过中唐^[3]。

笔者认为，定窑创烧时间的最终确定，还有待于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虽然在定窑创烧时间这一问题上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于晚唐以后定窑的发展脉络，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尚比较一致，即：晚唐至五代时期定窑获得较快发展，北宋和金代是其繁荣时期，元代后期以后，定窑较大规模的瓷器生产已告竣，并逐渐停烧。

五 定窑的烧造品种及艺术特色

体现唐代白瓷最高水平的是河北省内丘县邢窑烧造的“类银”、“类雪”的白瓷。除了邢窑以外，唐代定窑、巩县窑、密县窑、耀州窑等均烧造白瓷，但产品质量总体上均略逊于邢窑。唯有定窑白瓷中质量精美者不亚于邢窑白瓷。五代时期的定窑瓷器胎体变得轻薄，造型多模仿当时的金银器，颇显俊秀。《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载：“……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使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4]碑石立于大周显德四年（957 年）二月。说明五代时期定窑瓷器产量很大，以至于朝廷派瓷窑商税务使冯翱在当地收取瓷器税。到了宋代，定窑白瓷无论在产量还是质量方面，均比唐代有所提高，产品行销海内外。因此，定窑堪称 10 世纪下半叶至 13 世纪我国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白瓷窑。

北宋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除此之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瓷及低温铅黄、绿两色釉瓷。黑釉、芝麻酱色釉瓷即文献所称的“黑定”和“紫定”。成书于明代洪武二十一年曹昭《格古要论》之“古定器”条曰：“……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俱出定州。”^[5]定窑低温铅绿釉瓷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亦不见于传世品。1957 年 3 月故宫博物院派人调查定窑遗址时，在窑址发现了绿釉刻花云龙纹盘残片，证实了这一品种的存在^[6]。1969 年河北省定县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绿釉净瓶和绿釉弦纹瓶，进一步证明了定窑产品中这一品种的存在。而静志寺塔基出土的低温铅黄釉鸚鵡执壶和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 年第 8 期。
[2] 穆青：《早期定瓷初探》，《文物研究》第十期，黄山书社，1995 年。
[3] 韩立森等：《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 年 1 月 22 日。
[4] （清光绪）周斯亿、温亮珠修，董涛纂：《重修曲阳县志》（卷一一），光绪三十年（1904 年）刊本。
[5] （明）曹昭：《格古要论》，辑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71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6] 冯先铭：《瓷器浅说》，《文物》1959 年第 7 期。